

当下小文谈>>



□叶小文

○叶小文: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,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,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中国文化向来重“和”,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因此史上各教各派,大都求同存异和睦相处,甚至取长补短互通互融。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:“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,现代世界极为需要。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。”

民间传说有“虎溪三笑”的典故。虎溪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前,相传东晋高僧慧远驻锡东林寺时,来访和参拜者络绎不绝,常常宾朋满座,谈笑风生。但慧远送客,一向不过虎溪。一天,诗人陶渊明(也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)携道士陆修静来访。儒释道三位高人相谈甚欢,临别依依不舍。

慧远送客,仍一路谈笑风生,竟不觉破了惯例走过虎溪,溪旁有虎见状都惊奇地欢叫起来,三人大笑而别。后人于此建“三笑亭”。其实,慧远与陆修静并非同时代人,交游之说难免牵强。但南北朝以来,儒释道交流交融渐趋流行,“虎溪三笑”便传为美谈。

日前,受万众齐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所感召,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(正好也是东林寺现任住持),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,以及儒学家,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,三位堪称当代儒释道的大师相聚一堂,“拜水都江堰,问道青城山”。我应邀前往为他们主持论坛,躬逢其盛。三老相谈甚欢,传说中“虎溪三笑”的愿景,似乎真的出现了。

所谈围绕一个“和”字。任道长说,道的属性是“和”。天地日月森罗万象,芸芸众生千差万别,无不蕴含着两重性,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。当利益冲突,矛盾纠纷时,不妨彼此体谅、委曲求全,就能开阔胸襟,以德报怨,所谓“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。传印法师说,佛教讲“理事圆融,事事无碍”,即是教人克服贪嗔痴的欲念,达到和谐的境界。身和同住、口和无争、意和同悦、戒和同修、见和同解、利和同均。杜维明教授说,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,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。对“和”与“同”的不同态度,竟是君子和与小人的分野。以“和而不同”为主线,儒学追求的“和”,是以“和”对“多”集散成大,是以“和”制“合”平衡

互补,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。“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

看来儒释道三家的确以一个“和”字相通。因为,“和”的哲学就是“会通”,既有包容,更有择优;既有融合,更有贯通;既有继承,更有创新,是一以贯之、食而化之、从善如流、美而趋之。“和”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,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,“和”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,因而能够与时俱进,与时俱进。

“虎溪三笑”又现,一个“和”字会通。从中国传统文化、包括儒释道的学说中,挖掘和发扬“和”的丰富思想,与我们今天大力培育奋发进取、理性平和、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氛围,也可以“会通”。

心灵的依托,不能靠外来文化

——本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,对话文化与传统



国学渐热,传统愈显。当下我们为什么要弘扬传统,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国学。当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时,我们需要复兴什么样的文化,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已经做好了复兴的准备?宏大的文化对我们个人,有哪些切实的影响?近日,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。对这些问题,陈来先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。

图为9月底,陈来(左一)在昆山论坛



文/片 本报记者 韩适南

齐鲁晚报:在许多人看来,文化研究只是书斋里的打闹,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情调,和民众的距离太远,这些研究能帮我们解决住房问题与交通拥堵吗,能帮我们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吗,能让生活压力巨大的我们找到一丝精神慰藉吗?

陈来:文化是不能要求直接的功利性,所有文化都一样。贝多芬的音乐能解决住房问题吗?《荷马史诗》能解决就业问题吗?唐诗宋词了解得再多,就能帮人们面试了吗?不能。

但人生的需求是非常丰富的,是多层次的。例如信宗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?当然不能,但能改变你认识问题的态度。为什么宗教能一直存在,就因为它一定有能满足人生命中的一些需要。

不能说文化没有实际作用,只是我们对什么是实际要有一个全面了解,不能这么直接。黑格尔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,既然这么出现了,就有一定的价值。

许多四十多岁以上的人,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建树,也来参加一些国学班和文化班,就是因为随着人生的成长,他们对文化和精神的需求越来越丰富。

齐鲁晚报: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弘扬传统文化?直接借鉴西方等国家的优秀文化不可以吗?这个问题从清末以来就被反复讨论,您的态度是什么?

陈来:这百年来,对待文化的观点也是有些起伏变化,不能说这百年来都是全盘西化。

五四时期,在思想界、文学界兴起了新文化运动,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新文学运动。后来发展到全盘西化,但时间不长,十年多一点的样子。

五四时期正如《新青年》一样,代表青年的文化。青年的文化在当时成了主导文化。老一点的人说不上话,全是二十几岁的人。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,他们自己就会变。结了婚,生了孩子和一个大学生说话根本是不一样的。

接着就是“九一八”了,这时“五四”在主流文化里基本被甩掉了。这时不是民主,不是自由,而是团结。团结主要是依靠内在的传统。抗战中来动员大家的资源是什么?是传统文化,此时,传统文化就发挥了这样巨大的作用。

每种文化都有优秀的东西。弘扬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并不冲突,也不矛盾。比如我们对印度文明的吸收就是例子,没有人要拒绝西方文明,主要是怎么摆它。

弘扬传统文化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,所以必须不断学习西方文化来帮助我们,但有的东西是很难替代的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,这种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代替的。

精神家园的建设,心灵的依托,也不是靠外来的文化就能解决的。我们更喜欢跟自己的文化亲近,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,稳定

自己的心灵。

齐鲁晚报:从世界格局来说,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我们讲中华复兴,有一条是文化的复兴,那么我们应该复兴哪些文化?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,我们在文化上有没有做好迎接复兴的准备?

陈来:对我们来说,确实要复兴中华文化,一段时间以来,中国人是在挫败的、自卑的状态之中。总体来讲,文化复兴是讲三千年以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,一些世界观,价值观,以及认识世界的态度,对世界的审美的观念。

传统文化复兴,不是传统文化一家独大,是和现在已有的文化、自己创造的文化、其他优秀的文化一起复兴。

不能说我们做好了文化复兴的准备。这个口号提了十几年,现在有一些准备,不能说做好了,因为对文化的复兴,还是认识上有差异,有人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想法,许多做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人,还有这样的想法。有人认为,古代文化只有放在博物馆的作用,是死文化,和现代社会没有联接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没有做好。

当然有许多人在积极提倡。我觉得民间的反应不错,没有许多限制,没有各种条条框框。

齐鲁晚报:温家宝总理最近在联大推介中国,现在的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?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呢?许多人一直强调中国真正的复兴,是价值现

的输出,而不是廉价商品的输出,如果我们要输出价值观,该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?是改造后的儒家吗?

陈来: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,大大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,这个是差距非常大。从国际的关系来讲,我们发生了许多冲突,一个方面就是外界对中国不了解,对中国当代的政治不了解,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。因为中国当代许多东西是从古代来的。

现在没有文化输出的提法,我们主要做的还是让西方了解我们。十年前我们是韬光养晦,现在我们虽然有孔子学院,但主要是以教授语言为主,没有有意识地宣传中国文化,主要是让别人了解我们。

就目前来讲,许多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常见。有人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。

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,他的一个学生生长在美国,因为这个学生经常往来上海北京,所以对中国有很好的了解,但这个学生的历史老师,还是把中国人讲成十八十九世纪的样子。学生告诉历史老师他讲得不对,但老师不能接受。现在中国人是很急切的了解外面,而美国等一些国家有偏见,认为老子天下第一,不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齐鲁晚报:国学逐渐成为显学,但是许多人对国学的学习,还是以“旧典章”为主。在当下,我们如何学习国学,弘扬传统文化,让我们对我们产生实质有益的影响。

陈来:典章是和制度联系在一起,典章制度和价值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现在大家读得比较多的还是经典,就是经书。

不光是儒家。法家、兵家大家都在读,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读四书五经的还多。杂家、法家,还有黄老法家也有好多人读,读这些书的人,大部分都和现在的管理有关联。

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发,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,主要是四书。这个是不变的。现在在好多读经运动,读经班,广义上来讲,经典的还包括一些文学的作品,整体来看,文化方面、教育思想方面、典章制度的学习比较少。

陈来简历

陈来,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,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著名哲学史家。师从张岱年先生、冯友兰先生。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,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、宋元明清理学、现代儒家哲学,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。

身边的传统>>

赊卖鸡苗说诚信

□梁开文

记得小时候,我们农村每户都会养上几只老母鸡,这些老母鸡一天下一个蛋就会给家里省下买鸡蛋的费用,而省下的钱男人可以买包烟,女人可以买棵菜,孩子可以交学费。每当村口响起“小鸡苗,卖小鸡”的叫卖声时,乡亲们总会围上去凑热闹。卖鸡苗的大伯推着自行车,后面笼子里的小鸡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仿佛在努力地推销自己。

遇到买鸡苗的乡亲,大伯便把鸡笼卸下来,经过一连串貌似专业的鉴定,我妈和众邻居都挑好了鸡苗,但是并不付钱。卖鸡苗的大伯只是将交易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,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。

小鸡苗随着时间和期待慢慢长大,三两个月之后,卖鸡苗的大伯重新回到我们村,不过这次他没带鸡苗,只带着那个笔记本。笔记本上或许写着“郑庄,小文,10只,东头,家后有一池塘”。意思便是“郑庄村梁开文家买了10只鸡苗,家在村东头,屋子后面有一个池塘做记号。”

大伯走到我家门外大声喊:“家里有人吗?收账的来了。”

“有人”,大多数时候,我会和我妈一起出来,“收鸡苗账的是吧?”

“是啊,你家鸡苗成了几只母鸡?”

“买了10只,最后成了6只母鸡。”

“哦,三六一十八,你给我十八块钱就行了。”

“嗯,给你钱。”

不到二十元的生意,历经几个月后以如此简单的形式终于完成,当我写这些东西时,自己也不相信是否真的存在过这种交易方式。后来问起我妈,她说:以前赊卖鸡苗的很多,现在没有了,现在邻居间都不轻易往外借东西了,谁还敢把鸡苗卖给陌生人啊。

之所以买10只鸡却只付6只母鸡的钱,是因为乡亲只想养母鸡用来攒鸡蛋,而不想养公鸡打鸣或吃肉,因为在农村比公鸡起得早的人很多,而鸡肉在我小时候比鸡蛋奢侈百倍根本吃不起。卖鸡苗的大伯没有火眼金睛,他也看不出哪只小鸡苗会长成大母鸡,不可能给买主提供所需要的母鸡苗,于是账就这么算了。而即便鸡苗夭折,大伯也一般不予追究。

这种交易的关键是建立在彼此绝对信任的基础上,而在充满怀疑的今天,你能和我一样,都没有想到这种交易曾经存在过。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一点彼此信任,这样才有利于将以前人心的淳朴和现在经济的繁荣结合起来,实现全面发展,促进社会和谐。